

新史料与
新问题

中外关系

史

荣新江 李孝聪 主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甲午关系史

张其成著

商务印书馆

ISBN 7-100-04211-1

定价：12.00元

中外关系史

新史料与 新问题

荣新江 李孝聪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2002年11月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召开了“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书收录了其中33位中外学者提交的会议论文，内容涉及以下七个方面：(1)图像·文本·碑铭：新发现与新解读，(2)简牍与文物：考古新发现与研究，(3)舶来品与外来文化：新问题与新探索，(4)手稿·游记·著作：明清来华传教士研究，(5)天文·地志与舆图：多角度的新观察，(6)域外遗珍：海外史料的调查与研究，(7)周边文物与地方史料：新旧资料的互证。

这是以各种新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以古代中外关系史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次盛会，也是近年来中外关系史领域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现，书中发表了不少新资料，同时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也提出新的建议。这部21世纪初叶出版的专著，利用新史料不仅补写了历史，而且提出了新问题，开拓了新领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荣新江，李孝聪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ISBN 7-03-012442-1

I. 中… II. ①荣…②李…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文集 IV. 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4719号

责任编辑：孙 莉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黄华斌

封面、环衬用图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年1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2

印数：1—1 200 字数：712 000

定价：9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目 录

导 论

- 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旧史料的一个概观 荣新江 (1)
- 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的研究——范式的转变与汉文文献的利用 黄时鉴 (9)

图像·文本·碑铭：新发现与新解读

- 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
中的流播与变形 邢义田 (15)
- 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 罗 丰 (49)
- Two Tokharo-Gāndhārī Bilingual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 Lin Meicun (79)
- 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 马小鹤 (99)

简牍与文物：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 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 张德芳 (147)
- 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 王 素 (149)
- 《三临辟雍碑》与晋武之文教视野 张乃翥 (163)
- 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 张庆捷 (173)
- 石刻佛经中的新发现与新解读 张 总 (205)
- 圣彼得堡藏丝绸之路文献文物 府宪展 (225)

舶来品与外来文化：新问题与新探索

- 中国祆教画像石的“语境” 姜伯勤 (233)
- 六世纪前后中国祆教文物叙录 施安昌 (239)
- 隋虞弘墓志释证 周伟洲 (247)
- 西域祆教三联神崇拜与山西介休祆神楼 万 毅 (259)
- An illustrated astrological manuscript in the Turfan collection (8th ~ 9th century)
..... Frantz Grenet (271)

手稿·游记·著作：明清来华传教士研究

- 《广州通纪》初探 高田时雄 (281)

- 南怀仁《坤輿格致略说》研究 邹振环 (289)
- 梵蒂冈图书馆藏白晋读《易经》文献初探 张西平 (305)
- 再论白晋的《易经》研究——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
目的及反响 韩 琦 (315)

天文·地志与舆图:多角度的新观察

-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舆图特藏 李孝聪 (325)
- 明末西方日晷的制作及其相关典籍在中国的流播——以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 1538 ~ 1612)《晷表图说》(*Gnomonices*, 1581)为中心 冯锦荣 (337)
- 十九世纪早期在华传教士所描绘的美国——高理文及其《美理哥合省国志
略》 李晓杰 (367)
- 《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 朱玉麒 (383)

域外遗珍:海外史料的调查与研究

- 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 周振鹤 (405)
- 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 on Pith——A European Perspective Ifan Williams (411)
- 19世纪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画纸研究 程存洁 (429)
- 第九世班禅喇嘛对印度的访问——清朝官方文献与英国外交秘密档案及其
他私人记载比较研究 房建昌 (439)

周边文献与地方史料:新旧资料的互证

- 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俟弘福墓志释证 葛承雍 (449)
- 日本僧成寻与其入宋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 郭万平 (457)
-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善邻国宝记》及其相关史料 伍 跃 (463)
- 李英宗朝婚姻关系与权力结构研究 耿慧玲 (481)

- “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499)

- 后 记 (507)

汉唐中西关系史

——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

从汉朝到唐朝，是中国与西方各国交往的最盛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接受了许多西方文明要素，大到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小到音乐舞蹈、穿戴服用，它们在许多层面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向西方世界提供了丝绸、纸张及其制作技术等等，为西方各国物质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因此，汉唐中西关系是一个涉及中西史学两方面的重要课题，相对于中国断代史和某些专题史来讲，它的研究难度较大，其中，史料的零散是阻碍研究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1930年，张星烺先生编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计六册，把传世的中国史籍和部分外国史籍中的有关记载辑录出来，并加以注释和考证，成为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最好的史料合集^①。周一良先生在《〈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序》中对此书给予很高评价：“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不包括近代外交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先生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六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文化交流之内容。”^②我非常赞同周先生的话，虽然今天许多人在其论著中常常不提张先生的书，但我相信，这些研究著作必然是以张先生的大著作为起点的。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了大批新的文献材料，如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新发现了许多石刻类史料，同时，20世纪初出土的大批迁居中国的胡人留下的胡语文献，如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梵文、叙利亚文文书和典籍，陆续翻译成现代西方文字，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考古文物资料在不断出土，不断刊布。这些材料更加分散，研究的难度也更大。但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这是陈寅恪先生号召大家利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的名言，发表的时间也正好是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的同一年^③。新史料对于汉唐中西关系史来讲，意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辅仁大学，1930年；张星烺编，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中华书局，1978年。

② 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页；收入《周一良集》第4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586页。

③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册，1930年；此据《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266页。

义更加突出,新材料不仅可以补写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问题,使研究者开拓出更多新的领域。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发掘、整理出了丰富多彩的中西关系史料,使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汉唐中西关系史,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930年时所知道的状况。

二

尽管我们对新史料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及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是零散地、陆续不断地刊布出来的。而且,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如敦煌学)来说比较薄弱,迄今为止也没有一本可以依赖的“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目录”,来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先行研究的指南,使得不少研究成果不够充实,顾此失彼,甚至重复劳动。虽然有些新材料在发现当初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事过境迁,有些慢慢地被人们遗忘。有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里受到很高的评价,但却很少转化成史学界,乃至中外关系史学界的通识,因此在中国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通论性著作中,往往总是老调重弹,而没能把这些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

在告别20世纪,跨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新史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做出总结。我和我的研究生们正在编辑《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目录》,希望能给学界提供一份有用的参考。在此,我仅就有关新史料做一些概要的介绍。所谓“新史料”,我的一个主要的参照物,就是张星烺《汇编》未收的史料,我曾编过一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引用书目,把它作为一个判断新史料的参照。

新史料主要来自出土文献,以下分别加以论述,间或提到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本文不是对这些成果的全面总结,文中仅就各类资料的研究前景提出一些展望。

1. 简牍帛书

近年来,新疆、甘肃的汉晋时期的遗址和长江中下游沿线的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和帛书材料,如尼雅出土的汉文和佉卢文文书、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江苏等地出土的秦汉简帛、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等等,都多少等地包含了一些珍贵的中外关系史料。有些材料还在继续整理当中,有的则已经陆续发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悬泉汉简中的西域史料,大大丰富了前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悬泉的发掘简报已经发表^①,但全部简牍的图版和释文尚未刊布。胡平生、张德芳编著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书,发表了部分重要的有关汉朝与西域诸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4~20页。参看吴炳骥:《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98~106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21~26页;又《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27~45页。

国的交往史料^⑤。张德芳、王子今、殷晴等先生已经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做过探讨^⑥。最近,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又利用悬泉汉简贡献给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⑦。相信随着这批汉简的全面公布,将会引起更多的讨论,取得更新的研究结果。

继20世纪初楼兰、尼雅发现佉卢文资料之后,近年中日尼雅考古队发现的佉卢文简牍数量不少,但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们期望其中会有不少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尼雅新发现的汉文简牍不多,但1930~1931年斯坦因在尼雅发现而没有带走的汉文本简,最近在英国图书馆找到了它们的照片^⑧。林梅村先生发表《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揭示了其中保留的一些重要史事^⑨。

江淮地区近年来发现了大量的简帛资料,其中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不多,但有些零散资料对于理解早期中国与南海的交通,颇有帮助,如饶宗颐先生最近揭示的王家台秦简《归藏》所提到的“周穆王卜出师而枚占”,尹湾汉墓简牍中的“象林候长”,均值得重视^⑩。数量更多的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因为主体部分尚未发表,因此还不清楚到底能够提供给我们研究中西关系史多少有用的新资料。

简帛材料十分难得,总体来讲数量不多,但价值很大。目前,简帛研究,蔚为大观,我们应当从纷纭复杂的研究文献里,辑录有关中西关系的史料,在文字专家解读的基础上,加以历史学的研究。在这方面,还应留意流散海外的汉晋简牍的收集和整理,因为有不少资料尚无清晰的图版发表。

2. 敦煌吐鲁番文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但由于大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由于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一些重要的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已经整理出版,如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沙州图经》、三种摩尼教残经、两种景教文献和敦煌文书《唐天宝十载敦煌县差科簿》,早已是中外关系史学界经常引用的资料。吐鲁番、库车、焉耆发现的梵文、吐火罗文佛典和伊朗语、突厥语摩尼教残卷,也是西方学者迄今为止热衷的研究课题。近20年来,由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学者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3~174页。

⑥ 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91~95页;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76~77页;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10~17页。

⑦ 提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11月15~16日。

⑧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250~290页;Wang Jiqing,“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24.1, Spring 1998, pp. 23-74;后者包括清晰的图版。

⑨ 原载《九州》第1辑,中国环境出版社,1997年;收入作者《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256~264页。

⑩ 饶宗颐:《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华学》第5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2~3页。

有机会到海外调查，而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首的几家出版社的努力，近 90% 的海外所藏敦煌文书资料已经用清晰的图版印成大型图录^{①①}，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工作。

由于资料的全面公布，我们可以系统地收集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资料，特别是散见于敦煌寺院账目中的资料。在这方面，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为我们检索文献提供了方便^{①②}，但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图版不够清晰，有些文字仍需再斟酌，而《俄藏敦煌文献》的资料在当时根本见不到，因此大多数未予收录。吐鲁番文书的情形与敦煌文书类同。其中 1959~1975 年间新发现的汉文文书，已经由唐长孺先生为首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整理出版，而且新刊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图文兼备，极便学者对照使用。

姜伯勤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依据专题钩稽了大量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资料，并给予精辟的解说^{①③}。但敦煌吐鲁番文书数量庞大，其中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值得研究者发掘利用，如早在 1928 年就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全文公布的《历代法宝记》中，就有一段十分珍贵的有关摩尼教和景教的记录，大概因为《历代法宝记》是一部剑南道禅宗和尚编纂的灯史，因此未能引起中西关系史研究者的注意，实则这条材料对于已经几乎穷尽的汉文摩尼教和景教史料来讲，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①④}。像这样的材料，我想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不断地被发现，一些旧有的资料也会获得新的解释。

3. 石刻碑志和题记

中国各地保存有大量石刻史料，主要有石碑、墓志和造像题记三大类。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石刻史料的合集，包括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千唐志斋等处所藏碑志的拓片，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出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墓志的照

①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英国图书馆等编《英藏敦煌文献》，14 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 年；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1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立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合编《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艺术博物馆合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98 年；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史树青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11~12 卷，东京柳原书店，1994 年。同书编委会《甘肃藏敦煌文献》，6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①② 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 辑，北京，1986~1990 年。

①③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

①④ 参看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未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王尧编《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北京出版社，1999 年，130~150 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 年，343~368 页。

片,其中许多是首次发表的新材料^⑮。这些石刻材料中包含有较多的外国来华人士和外来宗教的内容,我曾经检索收集过其中粟特人的墓志,迄今已经有上百方之多。近年有关入华粟特人研究的进步,部分就是因为利用了粟特人墓志。在这类墓志本身的整理工作方面,罗丰先生的《固原南郊隋唐中亚史氏墓志考释》,可以说是一个典范^⑯。这些石刻资料里面,有时包含有极其重要的有关中外关系的新信息,比如波斯人李素的墓志,不仅提供了一个曾任唐朝太史令的重要人物的事迹,而且也牵涉到希腊、波斯星占学的传入中国和景教传播的问题^⑰。由于仍有不少石刻材料尚未出版,我们相信,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

4. 胡语文献

在敦煌吐鲁番乃至中原地区,都多少不等地出土过来华外国人所留下的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西方考古学者攫取到手,带回西方。经过各国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近一个世纪的解读研究,已有相当一批文献被译成现代英、法、德文,其中有许多极其珍贵的中西文化交往史料,如敦煌长城烽燧下面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⑱、吐鲁番出土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序》^⑲,许多都还没有完整的或令人满意的汉文译本。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所得也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如黄文弼得自吐鲁番的《高昌回鹘摩尼教寺院文书》^⑳、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粟特文奴隶买卖契约》^㉑、西安

⑮ 其中图录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上下,文物出版社,1984年;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总编辑委员会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录文集有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吴钢编《全唐文补遗》,7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图文对照本有毛汉光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8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年;昭陵博物馆(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等:《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贰、陕西壹贰、重庆壹),文物出版社,1994年、2000年、2002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王锦厚等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墓志精粹》,文物出版社、日本中教出版社,2000年;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0卷《墓志拓片》,日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⑯ 原载《大陆杂志》第90卷第5期,1995年,13~33页;第6期,17~38页。又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⑰ 参看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原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2~90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38~257页。

⑱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SOAS*, Ⅺ, 1948, pp. 601-615; J. Harmatta, "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153-165.

⑲ 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aischen Hymnenbuch (Mahrnamag)*, Berlin 1913, pp. 3-40. H. - 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⑳ 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497~516页;又《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529~548页。

㉑ 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馆:《麹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隶买卖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Ⅳ,1988年,1~50页+图版一;汉译文载《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108~115页;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49~54页;收入作者《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68~79页。

出土的汉语与婆罗钵语的《苏谅妻马氏墓志》^②等，也异常珍贵。这类文献的语言属于古代死语言，要准确译出，需要做大量的对证和考释工作。近年来随着这些语言研究的进步和相关的对比材料的增加，对这些胡语文献的解读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比如粟特文古信札，使我们有了更为可靠的英文译本^③。这些胡语文书，从内容或者词汇上有不少与汉语文书相关，马小鹤先生关于东西方摩尼教词汇的对比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的样板^④。尽管把这些胡语文献译成汉语难度很大，但价值也大，我们希望中国学者能克服困难，把这批胡语资料系统全面地译出，使之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一部分。

5. 传统古籍

如果对比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所利用的书籍，还有一些传世的史籍不知何故为《汇编》所漏收。如《水经注》，其中包含大量中印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也保留了不少求法僧的记录，大概因为当时无善本可依，因此《汇编》全未采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水经注》的整理本^⑤，可以对照伯戴克(L. Petech)对有关部分的译注^⑥，加以重新钩稽和整理。此外，20世纪3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传世古籍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新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影印古籍中，因为发表了一些过去没有公布的文献资料，所以可以从辑出一些相关的内容。而有些《汇编》已收录的书中，亦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发掘出新的史料。

② 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9期，458~461页；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195~202页；W. Sundermann & Th. Thilo, "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1.3, 1966, pp. 437-450;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 pp. 363-376; H. Humbach and Wang Shiping, "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 28, 1988, pp. 73-82;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295~305页；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西域文明》，251~258页；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国学研究》第10卷，2002年，1~22页。

③ N. Sims-Williams,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eds. A. L. Juliano & J. A. Lerner,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with The Asia Society, 2001, 47-49; Sims-Williams, N.,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hrsg. von Maria Gabriela Schmidt und Walter Bisang unter Mitarbeit von Marion Grein und Bernhard Hiegl,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2001. 此前，中国学者主要利用 J. Harmatta 的翻译，见上引 "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可喜的是，过去我们无法利用的第5号古信札，最近也已翻译发表，见 F. Grenet, N. Sims-Williams and E. de la Vaissiè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2, 1998, pp. 91-104.

④ 比如，马小鹤：《摩尼教宗教符号“妙衣”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1999年，153~185页；又《摩尼光佛考》，《史林》1999年第1期，11~15、82页；又《摩尼教佛教符号“大法药”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145~163页；《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医王”研究》，《欧亚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243~258页；又《摩尼教宗教符号“明珠”研究——帕提亚文 mwrgr'ryd (珍珠)考》，《学术集林》卷17，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290~301页；又《摩尼教宗教符号“珍宝”研究——梵文 ratna、帕提亚文 rdn、粟特文 rtn、回纥文 ertini 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53~60页；又《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世界宗教研究》第四期，2000年，104~113页。

⑤ 其中以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最为详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⑥ L. Petech,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Roma 1950.

6. 文物考古材料

与出土石刻资料相似的是新出土的文物材料,最近50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材料,包括罗马、波斯与粟特系统的文物,如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罗马和伊斯兰玻璃器、波斯与粟特锦,以及表现宗教人物、神祇、胡人及外来文化的塑像和壁画,亟待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研究。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按发现的地点做过概要的总结^⑤。最近,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的“语境”》、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齐东方《丝绸之路与伊斯兰玻璃》、罗丰《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等文对相关专题做了透彻的研究^⑥。我想,今后通过学者们对大量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所进行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可以大大补充文献材料之不足,而且文物材料的形象性,可以和文献材料相互补充,互相印证。

三

近年来,我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收集整理上述这些文献材料(也包括考古文物资料),并加以考释研究。《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一书收录的一些文章,就是该项工作的部分成果。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汇为一编,把零散的史料系统地展现出来,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方便;也希望在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这一过程中,揭示出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上不为人知的史实,并根据新的材料,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以此来丰富我们对汉唐间中西文化交往史的认识。

^⑤ 《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91~344页。

^⑥ 以上均为提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11月15~16日。

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的研究

——范式的转变与汉文文献的利用

黄时鉴

(浙江大学历史系)

改革开放以来,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的研究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领域。人们又一次打开国门看世界,同时反看自己,看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研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至今仍在延续。在这个热潮中,历史上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备受关注。其中一个重大的话题就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它是以大航海为发端的新的世界历史运动中,西方与中国的第一次大接触,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和发人深思的问题。仅据徐海松所编《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论著目录》,1980~1999年间发表的有关文章约1000篇,专著和资料汇编有40余种^①。本文以这次会议的主题“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为视角,就此项研究中“范式的转变与汉文文献的利用”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研究范式的转变与汉文文献的突显

在海外,关于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范式的转变,从传教学(以欧洲为中心)的范式转到汉学(以中国为中心或以中国为本体)的范式。这个范式转变发生的时间,学界的看法略有不同,有人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已发其端,也有人认为从80年代起才出现重大变化。不过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那就是1982年谢和耐所著《中国与基督教》一书的出版是这次范式转变的标志。还有人提到钟鸣旦的《杨廷筠:晚明的儒学和基督教》(1987)。许理和以为这两个互补的课题使读者认识到“儒学的边缘部分是灵活的,是能够吸收外来的新思想的,而另一方面,其核心部分是排斥外来思想的影响的”^②。

传教学范式的研究所关注的是欧洲的传教士们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的传教方式,取得哪些成就,同时带入哪些西方科学艺术。这种研究大量依据西文资料,当然也利用一些汉文文献,而其主要成果则集中在一些著名传教士的传记上。

此后,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接受方面的问题,转到汉学(以中国为中心或以中国为本体)的范式,研究中国人如何对待传教士,如何对待基督教和西学,中国人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宗教文化的反应。进行这种研究,除了西文资料,自然要更多地注意利用汉文资料。越来越多的世俗学者加入研究,研究的视角也发生

^① 此目录载于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② 许理和:《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研究》,辛岩译,载《国际汉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429~447页。

变化。

在西方，这个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中国人对西教西学的回应的成果仍然较为微弱。据许理和的统计，直到1990年，用西方语言写成的研究明末清初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的论文仅有21篇，与当时研究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的论文已达230多篇相比，反差是十分明显的。研究中国人对西学的回应和西学传入的中国社会背景本身的成果更是微不足道。倒是在台湾和香港，以中国为本体的范式发展较快，成果也较显著，但基本上仍以人物为主。方豪有一系列的论文、专著《李之藻研究》和《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中下三册。还有黄一农、林东阳和冯锦荣等学者，他们写出一些颇有分量的论文。出现这种情况，我以为，除了其他的因素，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们对于汉文文献的利用先走了一步。

在中国大陆，从20世纪50年代起，相关的研究被纳入侵略和反侵略的范畴。就范式而言，这可以视作以中国为本体的范式的一种特殊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也发生转变，一方面实际上向以前的（传教学）范式回归，一方面又起步与海外的范式转变靠拢。这可以从上面已经提到的《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论著目录》中明显地察觉出来。也出现了一些颇有分量和见地的论著，而且研究正在深化。但是，总体上看，论著的数量和品质不相适应，较多的作品缺乏深度。一个较普遍的欠缺是对原始资料的掌握尚不充分，尤其少见新资料的开掘和钻研。

不过就研究的范式而言，我们也有先行一步之处。钟鸣旦说：“我们还可以既不采纳传教学范式又不采纳汉学范式，而是将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视作文化之间冲突和反应的历史，中国和西方两方面都要研究，而且将教会史、汉学和欧洲史联系起来。这样可以使人们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及其相互作用产生更深的了解。”^③实际上，这已是中国大陆一些研究者正在身体力行的做法。

不管怎样，研究范式的转变已经使汉文文献的重要性突显出来。而在利用汉文文献方面，我们中国学者、华人学者会具有较大的优势。

二、汉文文献的类别及其收藏编目状况

范式转变后的中心课题是“西教西学入华和中国人的回应”。范式转变后研究的新趋势需要特别注意掌握和开掘汉文资料，这为中国学者、华人学者在这个领域走到前沿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的史料整理方法和西方的文本评注方法，不时受到非难。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停留、更不能定位在这样的方法上。但是，事实上，历史研究总是以史料为基础，无论你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何种阐释模式。而如果上述的范式转变可以成立，汉文文献的重要性突显出来，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开掘、整理和出版新的汉文文献汇编就成了一个重大课题，也可以说是当务之急。

^③ 钟鸣旦：《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马琳译，载《国际汉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

为了做这件事，先要对有关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的汉文文献进行评估。许理和说过如下的话：“作为一个历史研究领域，这一学科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也不在于这一现象的持久影响。它特有的价值在于它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之前（也可能是世界现代史之前）文献资料最完整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献资料之丰富、尤其是文献资料之多样性是超乎寻常的。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可从如此众多角度进行研究分析的外来宗教运动，佛教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内行里手的评估。

所谓文献资料的多样性，可以大致分为六类：①传教士的通信和报告。②传教士为“外人”写的通信和著作。③传教士写的汉文著作。④皈依或同情天主教的中国人所写的作品。⑤反天主教的士大夫和佛教人士所写的作品。⑥其他散见资料。这六类文献中，前两类是西文，后四类是汉文。

关于西文文献，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等馆藏的编辑成册的资料为传教学范式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19世纪80年代后期，荷兰的IDC公司将伦敦大学非洲与东方研究院图书馆的特藏做成了缩微胶片，可以说基本的西文书籍都被它收录了，大大方便了研究。其他重要图书馆的收藏也有书目可资检读。

在后四类汉文文献中，第六类“其他散见资料”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但只能随着各人研究的进展逐渐得到开发和利用。因此，我们需要在这里叙说的是第三、四、五这三类。

这三类汉文文献无疑是一座富矿，它的主脉已经得到基本勘探。主脉有四，即：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巴黎国家图书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陈纶绪编的《罗马耶稣会档案处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已在不久前问世。原来，顾保鹄在为《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写的《序》文中说到，全球收藏明末清初天主教图书及文献最多的三家是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巴黎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现在看来，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必须增列进来。

从已知情况看，除了这四家，其他的收藏均有限。如美国方面，据克洛齐《基督教在中国，关于美国图书馆与档案馆所藏资料的学者指南》^④，其中有关的汉文文献并不太多。日本的收藏约有100余种。

四家主要收藏单位的数据是：上海图书馆原徐家汇藏书楼特藏，原有400多种，除去被运走的80种，当存有不小于300种。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超过500种。1902~1912年间，古朗编有《汉朝日诸籍书目》（Maurice Courant,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areens, japinai, etc.* Paris: Ernest Leroux）。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汉籍收藏现有两本目录（伯希和遗稿、高田时雄修订《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1995年；以及高田时雄的《补编》，1997年），其中著录的有关汉籍不到300种。另有余冬

^④ Archie R. Crouch,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 E. Sharpe, 1989.